

# “冰花男孩”何时不需因苦难走红

张盖伦

云南鲁甸男孩王福满因一张照片“走红”。照片里,走了几十分钟路才到教室的他,头顶未化开的冰霜。这一幕上了网,引发一片“心疼”“励志”之声。于是,王福满成了“冰花男孩”,他的愿望有人聆听还有人帮他实现。近日,王福满和父母、姐姐被有关方面接到了北京,开始了一场“圆梦之旅”。

幸运女神突然开眼,给了王福满这样一场人生奇遇。只是,个人奇遇的背后,明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。它们不能被热闹喧嚣精心策划的活动所轻轻抹去。

安迪·沃霍尔说,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

成名时间。2018年开年,是王福满8年以来人生的高光时刻,他的走红,给了整个家庭新的希望。

但是,王福满为什么会红到被领到北京?不是因为他是王福满,而是因为照片拍下那一刻,他恰好在那里。在这场盛大的爱心动员中,王福满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切,也确实来得莫名其妙。

不是说王福满不该被圆梦。每个孩子的梦想都珍贵。只是把他架到这样的境地,让人心生忧虑。以后,这个男孩还有“不优秀”的权利吗?这份恩情,对他来说是激励还是负担?圆梦没问题,但媒体全程跟拍,最后还以盛大发布会结尾,帮扶的

尺寸拿捏,是不是有待商榷?很难说,这次为贫困群体的代言,会在王福满的人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。人生奇遇的后续,只能期待小小的王福满自行消化。

是的,王福满已经被动地成为象征和符号。贫困群体需要代言人。二十多年前有“大眼睛女孩”,前不久是“小马云”,现在,王福满接棒。代言人的“悲惨”或与人人的日常经验相去甚远的生活经历,能够戳中人们内心柔软之处,激起共情,并由此引发运动式的关心和帮助。

王福满“走红”后,各界伸出援手,很短的时间内,云南鲁甸收到了几十万元的捐款,和王福满一样的孩子们拿到了保暖的手套和衣帽。然而,这个群体一直存在。他们

一直在走这么远的路,怀揣着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念想,期待着走出深山的那一天。社会的关心,本应该是“锦上添花”,不该是“雪中送炭”。人生道路漫长,他们要靠自己更有持续性的方式好好走路。

王福满的梦圆了,真问题不能就此掩盖。孩子为什么需要长途跋涉去上学?学校为什么没有基本供暖设施?乡村教育的现状和短板,才是真问题。而这个问题,是运动式关心解决不了的。它需要各级政府的持续努力、持续投入和持续改善。

挺过苦难的勇气值得嘉奖,但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赞美,若能让苦难尽可能减少,那宁可“冰花男孩”和“冰霜女孩”们,没有这份因苦难得来的15分钟。

## 有口皆评

### 不是苹果烂了,而是环境变了

许茜

因出货量低于预期,华尔街分析机构近日将苹果股票评级从“买入”级下调至“中性”级,苹果股价也一度下跌0.3%。这是继去年12月19日以来,苹果第二次遭遇降级。

时隔不到一个月,评级连续下调,这样的表现很不“苹果”。细数近来苹果的新闻,几乎都是些坏消息——“电池门”“降频门”“手机销量创新低”……唱衰苹果似乎已经成了一些媒体的“政治正确”,甚至有人直言“苹果烂了”。

在多元化选择面前,消费也愈加趋于理性。于是,去年iPhone 8发布后,再不见排队“果粉”,而是门庭冷落。各大手机品牌的功能都差不多,消费者为何要为如此之贵的iPhone买单?

不只是手机,在全球取得傲人战绩的Apple pay,在中国同样遭遇了滑铁卢。在Apple pay入局前,国内支付业务已形成微信和支付宝双寡头格局,苹果虽想凭借庞大装机量奋力一搏,只可惜时机耽误,再难撼动市场。

不再那么闪亮的苹果,似乎已有转变的迹象。1月18日,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用户,苹果公司开通微信公众号,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购买产品、寻找客服、咨询疑难问题。众多果粉戏言,高高在上的苹果也开始“接地气”。

但“接地气”只是第一步。摆脱技术优越感,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,利用已有市场优势,打造真正的本土化产品,这些深层的思维转变是更艰巨的任务。

犹记得十年前,诺基亚曾稳坐手机市场头把交椅,那时的“诺老大”对市场份额不足1%的“苹小弟”不屑一顾。接下来的三年上演了盛极而衰的戏码,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,霸主易位。

后浪推倒前浪,这是IT产业发展的必然。消费者没有长情,他们只会拥抱最懂他们的人,留给苹果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。

创新曾是苹果最亮眼的标签。在智能机刚刚兴起的时代,学习苹果曾是众多智能手机厂商的必修课。然而,在iPhone 5S之后,苹果好像再难给我们带来惊喜。之后的iPhone 6、7、8乃至曾被寄予厚望的iPhone X,都被指“创新不足”,被网友吐槽“四世同堂”。

而另一边,国产手机却在技术、营销策略上不断寻求突破。华为和小米着手研发芯片,向自主创新迈出重要一步;OV则深度耕耘线下渠道,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成为领军品牌……

### 中国科研质量登顶没那么容易

马爱平

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日前发布报告称,中国首次超越美国,成为世界上科学出版物总量最多的国家。

作为许多国内科研人员期待已久的消息,这足以成为新年伊始一剂令人振奋的强心剂。

报告显示,2016年,中国发表了超过42.6万份研究,占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总量的18.6%;美国约40.9万份;印度超过日本,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上升势头。

数量上来了,质量如何呢?报告认为,尽管美国面临的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,但美国仍是科技强国,推出了很多高质量研究,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,而且在将科学转化为宝贵的知识产权方面也表现突出。

实际上,我国的科研质量登顶仍任重道远。科技出版物和科技论文的数量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,但却不是全部。目前中国在科研上最欠缺的是原始创新能力,在这方面,中国距离世界科技强国还有很大差距。根据《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—2017》,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只排在世界第17位。

以论文的评价指标为例,根据此次NSF发布的该报告,在论文被引用数量方面,美国排名第三,低于瑞典和瑞士;欧盟和中国分别

排名第四、第五。

再看看中国的专利质量,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虽连续多年世界第一,却在质量上却广受争议,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,而且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年限较短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1月18日发布的专利统计数据显示,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35个技术领域之中,2017年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高于国外来华发明专利拥有量的高达30个,但从维持10年以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来看,国内却在29个技术领域数量少于国外。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仍是我国的短板。

科学研究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,单靠投入、人力、物力论文数量和专利数量可能还不够,真正的原始创新最需要的是,能贡献新科学思想,能开辟新科学领域,能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最重要的关键因子。

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到今天,求量的阶段已经过去,求质的阶段正在到来。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,中国科研质量登顶没那么简单,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该直面现实、勇于攀登、甘坐冷板凳、不懈怠、不浮躁。科研管理部门更应为科研工作者创造良好、安心、稳定的科研环境,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土壤,这样才能激发科研工作者原始创新的热情,不走弯路、不走捷径,让中国科研质量如愿登顶。

### 治理农业污染,社会资本少不了

李敬锁

近日新华社报道,甘肃省利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,通过“财政贴息、以奖代补”等方式和社会资本合作,建设了一批加工企业和回收网点,用以回收利用废弃地膜,取得了良好成效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,探索出了一条治理农业污染的新路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,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。乡村要美,就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坚持绿色发展之路。但是当前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,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。据2014年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》显示,全国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达19.4%,约有333万公顷耕地因遭受污染而不宜耕种。如何治理受污染土地,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。

但是,校长爱才,挖之有道。“挖人”应以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推动思想文化真正繁荣为目标和动力。也就是说,高校在为人才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基础上,与其开出天价挖人,不如列出若干个有价值的课题,通过设置学术课题和公正的评价体系吸引人才。进而以学术旨趣为纽带构建有梯度的学术团队,围绕重要课题共同攻关,在推进科研中丰润学术土壤,培养青年人才,营造“天下熙熙,皆为学来,天下攘攘,皆为学往”的生动局面。

下,财政收入增速趋缓,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。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的做法也已行不通。

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(PPP)的方式,能有效发挥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各自优势,提高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效率和效果。政府部门公益性利益的追求,使其更为关注治理行为及其效果,而对治理效率和成本的关注往往缺乏内在的驱动力。社会资本逐利的本性,使其更为关注治理的成本收益和效率,而在实现和保证治理效果的过程中,可能存在道德风险。因此,寻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各自利益诉求的平衡点,可以使治理效率和效果得到较好的保障。

不论采用哪种治理方式,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,都应充分考虑其追求利润的利益诉求,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。根据不同治理方式的成本收益情况,采用不同的PPP模式。如对于营利性项目,可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;对于准营利或无营利的PPP项目,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、政府补贴的方式。当然,也要建立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承担机制,让承担者承担自身擅长管控的风险。这样才能使政府和社会资本形成“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、全程合作”的共同体,协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。

## 观点速递

### 大学之大 非谓有大名之谓

高校改名升级,连接更多资源,对一所学校的成长当有所裨益。但高校办学水准的提升,需要多方面因素的支持。改名本身并不必然提升学校综合实力。说到底,改名只是形式,提升办学水准才是根本。国外的诸多名校,诸如巴黎高等师范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名字都不够亮眼,但不妨碍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一些在专业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国内高校,也因“小而精”的发展模式获得国内外的赞誉,改名同样不在这些高校未来发展的事项中。

——行北(《中国青年报》)评新一轮高校更名大幕正式拉开

### 时代需要更多 精神世界的拾荒者

人们为韦思浩老人感动,何尝没有时代大背景的原因。文化与文明,是舆论场经久不衰的核心议题,几乎每过一段时间,就会以公共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是一个最应该讲文化讲文明的时代,但在事实上却是一个引发文化焦虑的时代。在人们心中,哀痛莫过于“读书无用论”的盛行,国民阅读率始终不如人意,而有文化的人变成了“精致利己主义”,身上看不到应有的文明与教养。

——毛建国(《燕赵晚报》)评拾荒老人韦思浩的雕像正式在杭州图书馆向公众展出



扫一扫 关注科技评论员

## 对“文科院士”应保持一份清醒

王钟的

近日,清华大学宣布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,18位教授被评为该校首批文科资深教授。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表示,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,是清华大学进一步推动文科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。

消息一出,众多媒体将文科资深教授通俗地称为“文科院士”。近年来,许多高校都进行了相关探索,如以人文社科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多次评选“一级教授”,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等高校也逐步推出过文科资深教授的制度。

社会舆论对“文科院士”制度的关注,基于我国没有人文社科方面院士的现状。无需讳言,这种关注隐含了一句潜台词:与理工科相比,人文社科被矮化了,设立“文科院士”,让有影响和有学术水平的文科学者享受相应待遇,有助于促进人文社科发展。

以上说法在舆论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论者还列举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的设置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例子,以佐证“文科院士”既有历史传统,又有先进经验可循。

然而,在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性、荣誉性本质成为改革共识的当下,单单从“待遇”的角度出发,追求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某种“平等”,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。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“文科院士”制度,首先要避免走上院士称号权力化、利益化的路子。

与社会交往相对局限的理工科学者不同,人文社科学者天然地与社会接触紧密,他们成为公众人物的可能性更高。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家,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称号,就能够充分享受来自公众的荣誉。从荣誉角度看,为文科教授“正名”,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迫切性。

现实中,一些人文社科学者的物质待遇的确跟理工科学者有一定差距,从促进人文社科发展的角度出发,确有保障和提高优秀人文社科学者待遇的必要。但是,讨论学者待遇问题,跟设立以学术性、荣誉性为本质的院士制度,显然是两码事。

相关高校也意识到了两者的区别。比如,清华大学对文科资深教授设立的基本门槛有: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5年以上、参评当年的年龄原则上满60周岁;中

国人民大学也单独设立了“荣誉一级教授”的称号。显然,这些称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褒扬优秀学者的荣誉指向。

在舆论的喧嚣中,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当对设置“文科院士”保持一份清醒。与自然科学相比,在人文社科领域开展学术评价的标准之争、观念之争更加激烈,这也是有关部门在开展改革时步步慎行的重要原因。

当然,各校对优秀人文社科学者授予荣誉性的褒奖称号,是高校办学自主性的体现,自然无可厚非。以学校为主体设立评价标准,相对而言也更加稳妥。但是,必须避免所谓“文科院士”异化为分割学术权力和利益的工具,否则,人文社会科学反而难以健康发展,尤其对年轻的新生代学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

与历史问题复杂的自然科学领域院士制度相比,人文社科领域没有院士制度,恰恰为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片处女地。是否设立真正意义上的“文科院士”,当然可以拿到公共平台上讨论。无论如何,让学术更纯粹,让科研评价更客观公正,才是不同学科探索荣誉制度的共同指向。

## 高校人才交流别成了“摘桃子”大赛

眉间尺

高校“挖人”已经不是新闻。但有没有想过它的负面影响?近日,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军聚焦高校非理性“挖人”现象,提交提案建议完善人才流动管理机制。

高校开高价“挖人”本身不见得是坏事,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终于“值钱”了。据说,为了吸引人才,一些高校开出了800万元房补、100万元年薪的高价。头顶“院士”“长江学者”“千人计划专家”“杰出青年科学家”等帽子的人才,更成为首选目标。这不仅有利于改善至少高层次人才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,而且增大的科研投入也会对学术科研起到促进作用。

但是,高校盲目“引进人才”“挖人”成风值得警惕。这主要是因为目前高校“挖人”的标准单一、手段偏颇、目的功利,长此以往必然破坏我国整体学术生态,造成学术水土流失,学者队伍青黄不接,乃至搞坏一代学风。

稍加关注就会发现,如今高薪“挖人”

的高校当然有拉动本校多出学术成果、多培养人才、推动学科建设等长期诉求,但也不可否认还有迅速得到“回报”的短期目标。也就是说,房补也好,年薪也罢,其实都是一种投资,对此,校方也就是投资者有强烈的“回报”预期。而所谓“回报”,无非这些头顶桂冠的学者在政界、学界、产业和传媒领域深耕多年所形成的广泛人脉、学术名望或其他甚或不可明说的“资源”,而这些都可以为高校的学位点申请、学科评估以及课题申报等助力,甚至变现为校领导的政绩。

以学科评估而论,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是主要指标之一。于是乎,我们看到,有些教授发表论文时,今天署的还是甲单位,明天已变成了乙单位,有的干脆署上长长的一串头衔,因为每个头衔都是对新老东家的“承诺”和“回报”。同样,获取多少重大项目、科研基地等也是衡量高校“办学水平”的一大指标。由此,我们看到有的被引进者为展示“回报率”,就倾向于选择一些短平快、容易出成果的课题

来做,甚至重复自己过去的研究,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以名目繁多的“项目主持人”“课题负责人”等身份轻游走于各大高校之间,一个聘期换一个单位,成了“跳槽专业”的资深教授,而那些需要坐冷板凳、短期内拿不出成果的项目则爱答不理。

而且,高校忙于引进学有所成者,一心一意“摘桃子”,投向青年学者培养的资源精力也必然会减少。这股风刮久了,大家就见怪不怪,就会形成一种制度惯性,似乎“引进人才”是一个高校科研人事部门的首要任务,更根本的“培养人才”反而退居二线了。长远地看,这还有可能影响到青年学者的心态。有道是“言教不如身教”,一项实际政策的导向作用远大于打政治报告。有的“青椒”难免会以前辈、导师的人生轨迹为“榜样”,千方百计挤进各种“计划”“工程”,获得一个被挖的“资格”。

显然,这既不符合人才培养的方针政策,也不利于青年人才真正成长成才。

当然,话说回来,笔者并不是一味指

责“挖人”。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,而创新来自于交流。这既包括思想的交流,也包括人才的交流。当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后,不也是四处“挖人”吗?梁漱溟、陈独秀、胡适都是他挖来的,从而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不朽的辉煌。可见,僵化的学术体制既不符合学术规律,也不适应时代所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高校确实担负着促成人才流动的使命,而高校的崛起也需要人才的聚集。

但是,校长爱才,挖之有道。“挖人”应以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推动思想文化真正繁荣为目标和动力。也就是说,高校在为人才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基础上,与其开出天价挖人,不如列出若干个有价值的课题,通过设置学术课题和公正的评价体系吸引人才。进而以学术旨趣为纽带构建有梯度的学术团队,围绕重要课题共同攻关,在推进科研中丰润学术土壤,培养青年人才,营造“天下熙熙,皆为学来,天下攘攘,皆为学往”的生动局面。